

汉译大众精品文库·新世纪版

The American Century

美国的 兴盛与衰落

〔美〕唐纳德·怀特 著
徐朝友 胡雨潭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汉译
精品
新世纪版



美国

兴盛与衰落

「美」唐纳德·怀特 著
徐朝友 胡雨潭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The American Centu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的兴盛与衰落/[美]唐纳德·怀特著;徐朝友 胡雨谭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ISBN 7-214-03134-5

I. 美… II. ①怀…②徐…胡… III. 美国-概况-20世纪 IV. 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340 号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Rise &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orld Power
Copyright © 1996 by Donald W. White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1 by JSPPH
Made by permission of Yale University Press

书 名 美国的兴盛与衰落
著 者 [美]唐纳德·怀特
译 者 徐朝友 胡雨谭
责任编辑 余江涛 周晓阳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0.25 插页 2
字 数 472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134-5/G·1040
定 价 32.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前言

该研究的源起可以追溯到一个二战后青年的经历和受教育的过程。年幼的时候,我在学校读的那些教科书的内容,是关于摩天大楼、小麦地、整里整里长的工厂、油田的井架以及其他的一些象征着富足的景象——所有这一切,还配有关于工业生产和生活水平的统计数字。人们称美国是一个富庶的社会,并且是世界列强中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是有它自身的不足之处(种族隔离和局部的贫穷),但是,这些教科书暗示,善良的人们可以用他们手头所拥有的资源来改善这些不足之处。我乘火车从北方新泽西山区城郊的家乡到纽约市,一路上经过小河、田野、大烟囱正冒着烟的工厂、发电厂以及巨大的燃料油罐,驶过多层次的令人吃惊的隧道和高架桥工程,穿行在高高的新泽西公路下面,直到穿过了一条隧道以后,为螺旋型的帝国大厦所主宰的纽约空中风景线映入眼帘。乘渡船横渡哈得逊河,我在这个港湾看到远洋客轮和货轮进进出出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我想弄清楚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为什么美国——就像当时有一本书所宣称的那样——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民工业产值?拥有海洋上最大的商业船队?拥有空中数目最多的运输和商业飞机?拥有可以为饥饿的民族提供粮食的农作物?拥有钢铁、石油、棉花及其他的重要产品的最大的生产量?拥有巨大的货币金银储备量?拥有五大洋上曾经

出现的最强大的海军？拥有世界曾经出现的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凶猛的空军？对足以让教科书对此做出充分解释的这些资产的列举资料，我从来就不感到满意，因为其中的答案不是那么容易找到。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拥有大量人才的缘故，不仅仅是因为其他权力中心在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世界里碰上了艰难时代而已经衰落下去了的缘故。多种因素令人难以捉摸地组合在一起，其意义对我来说是不确定的。

读大学的时候，我开始把学业集中到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国家中何以取得了特殊的世界地位。但是，到我写完一篇关于可以解释国家的兴起与扩张的历史理论的高年级论文时，我却不得不调整我的思维以适应新的现实，来面对国家权力衰落的问题。

美国另一面的情况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早期正在形成，这就是其社会为人们的反抗所分裂，其军队在越南的丛林中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我进学校读研究生课程的时候），我面对的是一些新的问题。为什么国家正在从内部被分裂？它在商业上的杰出才能为什么正在衰退？它强大的军事实力又为什么发挥不了作用？

教科书里提供的答案，在过去是不能令人满意，现在是毫无价值了。我已经掌握了统计资料和地缘政治学理论——了解钢铁的生产水平及计算机微型电路的产出量，了解资本投资的比率，了解麦基德尔、施宾格勒及汤因比的主要思想。我阅读的关于冷战的一些资料，没有提供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框架来研究二战后期间美国国内发展之推动力的来龙去脉。关于冷战的传统的记述资料，对政府的政策持不批评的态度，没有注意到危险的情况，而修正派的历史阐释，由于扎根于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民族力量可以带来许多利益缺乏认识。无论哪一种立

场观点,都没有阐述到国家兴衰之基本问题。

我的目标是理解我所认识的这个世界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它的长处与短处是什么,因为我同时还想弄清楚哪些方面的路子走错了。我努力寻求一种途径,能够把经济、社会、文化及政治等一系列观点纳入美国在世界所处地位的大范围内。为了实现这一研究目标,我花了一些年的时间,尽最大努力阅读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走遍了全国各地,采访了有关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并且专心于了解有关年代所盛行的电影、音乐、电视及广播等通俗文化状况。对本研究的任何缺陷,本人单独承担责任。

一部内容覆盖年代长、范围广的著作,如果没有得到许多人的大量的帮助,是不可能完成的。首先,我得感谢保罗·贝克教授,他是我的同事和多年的朋友。他指导我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当时,这本书的许多观点正在形成;对他自从同意我开始从事一项范围极其广泛的研究以来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想表示我最真挚的谢意。他当时及后来的无私而真诚的指导,他给我的热切的鼓励,他对公正而无偏见的思想的默默的矢志追求,这一切都是极其珍贵的。我也同样想对我博士论文委员会的成员表示感激之情。我尤其要感谢欧文·昂吉尔,感谢他对我强调思路要清晰,感谢他就严谨的写作提供了建设性的建议。戴维·雷莫斯促使我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来审视我的观点和方法。我也感谢阿尔伯特·罗马斯科和文森特·卡罗索所给予的帮助与鼓励。纽约大学历史系主任玛里琳·扬,带有洞察力地阅读了初稿的一部分。我也感谢托马斯·本德尔、卡尔·普林斯、戴维·希克斯、弗雷德里克·舒尔特以及迈克尔·罗兹克。

我感谢研究国际事务的一些主要的历史学家。阿基拉·爱尔耶在阅读了我发表在刊物上的阐述本书第一部分观点的一系列文章中的一篇之后,在关键性的时候,鼓励我继续进行这项规

模较大的研究工作。约翰·刘易斯·卡迪斯为本书开头的几个章节提出了极有深度的建议。从麦克乔治·本迪那里,我除了了解到学者们规避的观念和知识界的情况外,还初步了解到了世界政治的情况。我花了一些年的时间帮助他对发展核武器的政府决策人进行广泛的研究,这一经历让我了解到许多有关逼迫政府官员不得不采取行动的那些限制性的实际情况。虽然我的研究项目必然地要偏离他作为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时参与制订的一些政策,但是他仍然鼓励我从事自己的研究,这就足见他高洁而开阔的精神境界;而他对本书早期一些初稿的严肃而缜密的评估,让我至今还对我曾经结识的最优秀的人中的一员满怀敬畏之心。

我还希望强调的是,在我从事该项研究的过程中,我所拜访的许多机构的图书管理人员及档案管理人员给了我巨大的帮助。许多季节以来,我在第42大街上的纽约公共图书馆度过了不计其数的日子。在这里从事第一手材料的研究工作,虽然经常与尘封的过期杂志和旧书籍打交道(可惜它们现在破碎了),却给人一种兴奋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我做大学高年级论文时,我就第一次体验到了。直到我最后为本书的引用内容做核对工作时,我一直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该图书馆使用它独到的收藏资料。纽约大学的埃尔默·霍姆斯·鲍伯斯特图书馆的图书资料员,也提供了无以计数和始终如一的帮助,尤其是在查询资料库、社会科学部、缩微资料中心以及艾弗里·费希尔多媒体中心。我特别要对档案资料管理人员表达感激之情,他们分别在下列机构工作:华盛顿市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纽约海德公园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密苏里州独立城的哈里·S·杜鲁门图书馆,堪萨斯州阿比林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纽约市时代联合公司档案馆,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康涅狄格州

纽黑文市耶鲁大学图书馆以及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我尤其要感谢国家档案馆军事档案部的爱德华·里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的戴维·黑格特两人给我提供的帮助。

国家人文科学资助项目,为我的研究慷慨地提供了资金支持。这些资金有助于为富有成效的学术研究提供大量的至关重要的条件。我同时还感激纽约大学历史系提供的博士后研究资金。

本书初步的章节内容,最初发表在一些期刊杂志上,我因此感谢它们的编辑和编辑部的读者所提出的可贵的意见,尤其是《外交历史》杂志社的迈克尔·柯冈,《太平洋历史评论》杂志社的诺里斯·亨德莱,《世界历史学报》社的杰里·本德莱以及《西方学报》社的罗宾·希格罕姆。杰克·霍珀用他的编辑技术和新颖的视角为全书原稿的一个初稿进行了润色。

我不知怎样感谢我的学生、研究生和本科生。关于对外政策和文化问题的讨论会和研究班,对本书的部分原稿进行了令人振奋的讨论,提供了有益的批评。有些优秀的研究生在不同阶段阅读了本书的展开部分,他们是戴维·考文、赛维里奥·乔瓦奇尼、彼得·布劳斯泰恩、余任秋、詹姆士·埃伯以及戴维·格鲁克。这本书确实是为我的学生们写的。我在完成这本书的原稿准备出版的时候,他们成功地使我成为纽约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优秀教育奖项的候选人。我坚定地认为,学术研究工作与优秀的教学活动并非互有抵触,而是相互依赖的,而学生可以从教师那里学到多少知识和智慧,教师就可以从学生提出的问题和独到的见解那里学到同样多的东西。至少,我还记得公立学校和大学的一些教师给我的影响,他们是:鲁丝·安·威奇尔曼,是她在六年班级的课堂上,用地图和富有创见的纲要,第一次向我

展示了世界历史和比较地理的奇观；詹姆士·尼古拉斯和威廉·吉里姆，他们在中学把这种对美国世界的了解又拓宽了一步；奥尔本·胡珀斯，在大学以他大师级的外交史讲座，既展示了历史的讽刺意味，又演绎了学习历史的乐趣。

我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关系保持了很久，并且是很有成效的。我的编辑查尔斯·格林奇，在本书出版的每一阶段，都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提出了友好的建议。奥托·里尔曼十分细致地把相对较长的原稿删削成最后的定稿。我还得感谢那些无名的外界读者，因为他们提出了思想性很强的建议。对在诸多方面给了我帮助但我却疏于提及的那些人，我表示歉意。

我的兄弟理查德·怀特，因为以前做过英语教授，所以在阅读原稿展开内容的过程中，提出建议要求提高本书的文学性。我的祖母唐纳德·华莱士女士，让我在她的新泽西越橘湖别墅用好几个夏天不少星期的时间来撰写本书。我的父母亲在我撰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持关怀和支持的态度。

序 言

纵观整个历史过程,文明国家已经兴起,并且向外拓展而越过了它们本身的国界。从它们的中心区域及首都所在的城市,延伸出庞大而复杂的贸易联运系统,精心设计的、网状一样分布的社会机构,广为分布的通讯系统,以及驻扎甚广的卫戍部队。对其自身的起源、命运及作用,它们的民族已经拥有了最基本的看法。如此最基本的看法,对古罗马人来说,是体现在神圣恺撒身上的征服国强加于被征服民族的和平;对阿拉伯人来说,是伊斯兰教;对英国人来说,是肩负“白人的责任”的帝国主义;对苏俄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制度。这些社会的语言、法律、宗教、政治及技术,影响了远离其故土的国家——即使在一度强大的帝国衰落或灭亡之后,情况依然如此。

文明国家所发挥的世界作用所经历的发展、成功及衰落的过程,是历史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一过程,经常离不开诸如气候、地理位置及资源之类的自然因素对社会特征形成的影响。世界观的形成,孕育于促使这些作用产生与消亡的各种各样的推动性因素。这些推动性因素包括:构成本土及帝国版图的领土扩张;人口数量的大小;青年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以及人口的生存力;技术的广泛用途以及经济体制的多样性;民众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的精神状态和对待周边事物的基本态度。

随着美国在世界上开始强大,繁荣及衰落,同早期国家中的

民族一样,美国人也在每一阶段对其自身在世界所发挥的作用表述了一系列看法。对赋予他们范围极广、牵涉面极大的作用的命运,他们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对这种作用在贸易、援助、文化、外交及战争中的种种具体表现,他们做了勾勒性的规划;而对这种作用终究化为泡影,他们仔细斟酌,并感到困惑不解。

本书研究的是,美国人是如何把他们的国家带入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中。本书用当代人的眼光来审视美国在世界所处的地位;并且,通过对当代人的著述和记录资料的探究,并参照他们所处理过的全部事情,来评价他们的感想。他们的思想与经历,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国家和社会问题。发挥新的世界作用的起因有哪些?为什么这种作用得以产生与发展,而最终却濒临危机并衰竭下去?美国人在世界上追求的是些什么目标?在对外政策上,成功的是什么?失败的是什么?其原因何在?

关于美国的世界地位的理论

在美国历史上,就其民族经验,有几种阐释被反复提及。一种理论认为,自然环境因素对其民族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树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一个海洋至另一个海洋之间扩展土地的美国人,经常以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来说明他们何以分享世界一部分的原因。19世纪40年代,出版商约翰·L·欧沙利文郑重地宣称,美国人的“天定命运”注定他们“将占有上帝为我民族每年增长的数百万的国民之自由发展而分配的该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欧沙利文相信,土地扩展所经过之处,无论是在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还是在俄勒冈,美国人都会传播商业的优点,都会开发自然资源。这种关于领土扩展影响力的观点,引起了舆论界及国会的注意——马萨诸塞州的州议员罗伯特·

温思罗普在这里看到了“美国民族天定命运权利”正在掀开“国家法律里崭新的一章”。

在稍后的 19 世纪,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及哈佛大学担任历史学教授的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对下述理论观点进行了严肃的史学论述,即领土及其不间断的移民与扩展,说明了美国的影响力和美国人世界观形成的原因。在 1893 年做的题为《开发地区边缘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意义》的著名演说中,特纳宣称,在美国民族的向西推进过程中,开发地区边缘锻造出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尽管他曾未准确地解释过“开放地区边缘”的含义,而只是用每 10 年一次的联邦人口统计数字来对其进行斟酌,并将其描述成“野蛮与文明”的交汇处。他认为,国土的扩展为那个社会提供了推动其形成强大国家的资源,如木材、贵金属、谷物、棉花及牲畜。不仅如此,特纳还与欧沙利文持相同的观点,坚信开发地区边缘对美国民族“天定命运”世界观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他确信,“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含义”,在美国的森林里隐隐约约地潜藏着并将被发掘。

特纳确信,开发地区边缘的诸多影响因素推动美国向其大陆疆域以外发展。随着北美大陆开阔土地的消失,美国以占据殖民地、发展贸易以及行使权力的方式,向国外谋求扩展。“几乎三个世纪以来,美国人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一大事实一直是扩展,”特纳在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写道,“预言这些扩展的活力将不再发生作用,是轻率的。”在 1898 年的美西战争显然证实了他的预测后,这位历史学家对美国介入远离连成一片的大陆领土的殖民化之举,并不感到奇怪。特纳把美国的向外扩展看成是世界政治中的一次革命。美国不仅摧垮了曾经发现新大陆的老牌帝国,而且为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奠定了基础——这一帝国从波多黎各岛开始,经过菲律宾,一直延伸到巴拿马运

河。

然而,开发地区边缘的经验对一个国家形成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影响,并不是确定无疑的。欧洲列强英国、德国和荷兰,虽然没有经历过类似美国开发地区边缘的发展过程,却在每个大陆用占有殖民地的方式来扩张领土这方面,走在世界的前面。俄国、加拿大、巴西都拥有辽阔的领土、大量的资源,以及多样化的气候,但是,它们自然环境的相似之处,并没有保证它们在国家力量或发展前景上有共同之点。最终,我们必须回到特纳的问题,即土地一旦被全部占有,开发地区边缘的影响力问题。特纳意识到,作为极富有吸引力和推动力的自然环境,浓密的森林已经被烧毁犁耕,开阔的平原已经被私人圈划起来;而作为投入了美国民族全部精力的向开发地边缘的移民活动,也已经进入了尾声。并不是没有终止的拓荒经历,能够改变整个社会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之命运,其渠道究竟何在,没有被说明清楚。

另有一种理论,试图从美国民族的先天禀性及其内在品德两方面,去解释美国人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该理论依据于美国民族的历史发展。北美主要地为欧洲移民居住,这些移民早先来自不列颠群岛及北方国家;19世纪80年代以后,一直到20世纪前10年左右的时间里,则来自南部及东部地区。至19世纪末,美国正在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跨入西欧列强的行列。这种情况,提出了为什么美国及欧洲具有向全球扩充其势力范围的能力等一些相关的问题。

1859年,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自然选择有利于生命的较高种类而不是较低种类的假设。该书不只是在当时的科学家中,也同样在当时的其他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巨大震动。后者把生物的进化原则,运

用到人和民族领域。他们声称,一个民族的工业、社会秩序及殖民地取得成功,是适者生存的结果。这样的一些观点,现代人听起来会觉得离奇而有趣;而在种族隔离制度建立及纳粹德国的种族优越感膨胀达到极致以后,听起来又是危险的。但是,达尔文本人就提议过,一个民族兴起,比另一个民族更强大、更广泛的扩展,其原因就在于自然选择。这种进步,除了依赖于民族的智能及分辨是非的能力,还依赖于人口的增长。达尔文还进一步就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颇有感触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说美国取得的非凡进步,以及其民族的优良品质,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种看法里很明显地有许多符合实际的成分。在过去的10或12代的时间里,精力更旺盛、更具活力、更具有勇敢气质的人,从欧洲各个地方源源不断地向那个伟大的国家移民,并且在那里取得了最大的成功……所有其他的一系列事情——正如最终导致希腊人心智的发达以及导致罗马帝国的兴起的一系列事情一样——只有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向西方移民的巨大潮流联系起来看(或者干脆认为是这股巨流的支流),才显得事出有因,富有趣味。”

在拥护达尔文学术作为一种社会哲学的人当中,主要人物是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同达尔文一样,斯宾塞认为,民族的力量基于生物为谋求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为获得最高智力,最大能源、勇气及爱国热忱而进行的竞争。美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则吸收了这些观点,认为美国人不得不竭力攫取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区域。为了建设一个帝国,他们的行为不得不具有攻击性。他们需要把他们的商业与贸易拓展到世界市场上去。他们应当建设一支装备有蒸汽推动发动机的现代化海军舰队,并且在国外港口为其设立加煤站。他们必须为赢得人心打一场鼓吹其观念的舆论战。扩张看上去是为科学法则所决定的

一种必然。

在首先企图寻求种族与美国的世界事务之间相互关系的人当中,哈佛大学出身的历史学家及哲学家约翰·菲斯克是其中的一员。“五分之四的人类把他们的世系追溯到英国祖先的日子不久就会来临,”他写道,“正如五分之四的美国白人今天追溯他们的世系时一样。”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约翰·W·伯吉斯在德国求学归来之后,开设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研究生课程。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理论可以应用到殖民政策上去。他得出的结论是,“组织政治活动的最高天赋”是被“雅利安民族展示的”;在所有雅利安人中,“条顿人以其优秀的政治天才,真正地支配了世界。”来自中西部的公理会牧师乔赛亚·斯特朗,在他的畅销书《我们的国家》中写道,因其不仅在世界上拥有最多的人口,而且已经创造着“最发达的文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将在北美建立起强大的权力地位。斯特朗预言,“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个强大的民族,会向南向墨西哥移动,向南向中美洲和南美洲移动,离开大陆向海中的岛屿移动,一直移动到非洲以及更远的地方。这种种族间竞争的结果将是‘适者生存’,对此有谁能够怀疑?”

就像他们曾经对“天定命运”的教条所持的态度一样,有影响的政府人员确信,种族是决定民族作用的一个事实。持这种观点的政治家的行列中,就有国务卿约翰·海,参议员阿尔伯特·T·贝弗里奇和亨利·卡伯特·洛奇;而首当其冲的则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经是伯吉斯教授学生的罗斯福相信,美国需要制订一项殖民政策。在其1889年出版的《西方的获胜》一书中,罗斯福写道,三个世纪以来,“讲英语的民族在世界未开垦地区的分布,不仅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中最为显著的特征,而且是所有事件中影响最深远、重要性最巨大的一件。”1898年,他同莽

骑兵^①一起坐在开往进军古巴与西班牙的列车上时,罗斯福阅读了埃德蒙·狄莫里斯的著作《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优越性》。该书认为,讲英语的民族优越于大陆上的欧洲人。罗斯福同意此看法,并满怀信心地把这种优越性引申到“美国的‘尚武精神’”上去。

这些观点中的主导思想,在后来麦迪逊·格兰特及洛桑普·斯托达尔德的“科学的”历史阐释中重现。格兰特当时担任纽约动物协会的主席。斯托达尔德早年在哈佛接触过种族能力的理论。两人主张,种族(而不是环境、气候或土壤)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种族与历史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亘古以来就存在着。“我们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吗?为什么各个国家采取了它们现在采取的行为方式?它们与美国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对它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斯托达尔德于1924年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提出这些问题。他提出,要了解世界政治,必须认识到各民族的体质特征以及一些其他的“种族因素”。

在这些看法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观点是,某个民族因为征服了世界的许多地方,所以它本身就固有优越性。但是,这种“科学的”研究历史的方法,没有在任何地方证明种族与世界事务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存在任何证据表明:人的肤色与人的智力或创造力有关系或从整体上讲,一个民族比另一个民族更适合于文化的发展,更适合于发展成为世界大国。一个民族在科学或工业领域暂时取得进展,并不意味着该民族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因为,这些领域的事业,是可以被学会、模仿或改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批评者们指出,种族理论被有意或无意地用来为国内的种族歧视或国外的殖民剥削辩护。也有许多社会达

① 1898年美西战争中由西奥多·罗斯福招募的美国第一志愿骑兵团的骑兵。

尔文主义者站到了帝国主义的对立面。西奥多·罗斯福终究为他曾经持有可据此进行帝国建设的种族观念而感到遗憾,并在这些观念里发觉了(大约在 1910 年前后)“滋生于半个世纪前的无知中的一种无意识的并且相当可悲的想入非非的因素”。持种族观念的后来的理论家们一个公认的欲望是,通过限制外来的移民活动,来挽救美国人血统的传统气质;因为,他们害怕“外来的移民活动威胁的正是我们民族的生存”。这只是个人的偏见,不是科学的观察得出的结论。主张种族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作用的理论是虚妄和荒谬的。

还有一种理论,表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国家在世界上所发挥的作用是其生产的经济结构和生产能力的产物。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所取得的巨大发展,一直深深地影响了目睹在生产、运输及通讯领域发生一系列变化的人们。随着工业技术于 18 世纪在英国产生,并随后传播到其他国家,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出了有巨大影响的研究报告《国富论》。在该书中,作为一个主要问题提出的是,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富有,为什么有些国家变得更加贫穷。斯密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把财富与国家在贸易、军备及建立殖民帝国方面取得的成功联系在一起。他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工人生产的技能与主动性里找到了答案。注意到美国当时(1776 年)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殖民地,斯密认识到“没有哪个殖民地比英国人在北美的殖民地取得了更快的进步”。斯密把北美殖民地的发展归诸于两个主要的原因:充足的优质土地以及人民以自己的方式处理自己事务的自由。

随着工业化进程跨过 19 世纪的中叶,在大英博物馆花费大量时间阅读和写作的德国哲学家卡尔·马克思,得出了与亚当·斯密的理论截然对立的一套经济理论。但是,在认为经济动力